

探访共和国第一座劳改农场 “飞地”清河

□文/图均据《瞭望东方周刊》作者：王开

为集训国民党特务，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北京市地方国营清河农场”于1950年2月24日成立

主动要求参加“集训”

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劳改农场。中央只是划拨了2400万斤小米，而他们却在几年内，收押改造了大批反革命分子，还使十余万亩荒滩变成了良田。

1949年初，北平。北新桥炮局胡同集中收押点的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越来越多。和平解放的北平正处于解放军军事管制状态。当时，对这些旧政权的残余势力采取集中收押的管理方式，是形势所需。

2月25日，新成立的军管会在这座古城的墙壁上贴出布告，限令国民党的军警宪特等人员到指定地点报到。新政权已作出决定，在国民党炮局监狱的原址成立“清河训练大队”，对这些前来报到的人员进行“强制集训”。军管会公安局为此专门设置了登记处，等待旧政权遗留人员前来验明正身。

新政权布告的威力很快显现，打破沉默的是国民党军统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这位国民党少将特务，带着被褥毯子，坐着自己的黑色轿车，直接开到登记处，在新政权工作人员核对姓名之后，走进清河训练大队。

相当一部分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人员是自己要求参加“集训”的，在他们想来，随着旧政权的败退，他们所谓的“合法身份”已被剥夺，而新成立的政权急需“人才”，或许在“训练”结束后，新政府还能给他们一官半职。一个名叫徐大麟的军统特务，甚至为此编造假履历，“自首”说当过国民政府大官——他以为这样就能在“训练”结束后获得更高的职位。

原本清河训练大队计划只是“强制集训”300人左右重要的国民党特务，但这个数字却不断被突破。至临近开国大典时，清河训练大队已经集中了1000余人。

但这些特务们很快发现，现实与想象完全不同。“晚上能听到有人在偷偷笑，还有些特务大喊大叫，大哭大笑。”原清河农场监察科科长、85岁的卢凤来回忆说，这些特务在被集中之后，在一次与外界通话时，有人拿着电话机哭起来。“训练队为什么起名叫‘清河’？就是要特务们将自己身上的罪恶、灰尘、不干净的东西清洗清洗。”卢凤来说。

第一座劳改农场

那时的卢凤来只有二十四五岁，是清河训练大队第一批工作人员。在北平和平解放前，他隶属中共冀东区北平情报委员会，一直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掌握了一些国民党特务的资料。

清河训练大队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基本选自中共冀东区北平情报委员会，清河训练大队大队长安林就是情报委员会负责人。

国民党特务源源不断走进清河训练大队，这给卢凤来他们造成了不小的工作压力。当时，清河大队只有17名干部，而国民党特务却越来越多。尤其是当这些历史反革命分子发现这里并不是什么镀金之地时，气氛越来越紧张。

起初，国民党特务们私下还保持着原来的组织关系，彼此互称官衔，上下级关系明确。大特务大都端着架子，沉默不语；小特务们则打水扫地，甚至给“官长”铺床叠被。清河训练大队让

他们自选班长，结果选出来的都是大特务。

“为了改造他们的思想，安林每周都会讲一次大课，主要是对比说理，让这些特务认识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卢凤来回忆，安林讲的是《人民公敌蒋介石》、《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美帝侵华史》、《论人民民主专政》等。

为了摸清特务们的底细，1949年10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清河训练大队号召“受训人员”用坦白检举的立功行动，争取做一名新中国公民。这种以敌制敌的方法非常有效，“他们开始主动坦白，并且互相咬、互相揭发。”

“交枪交弹药，交财产、金戒指、金镯子、金条、钻石……有的是他们写信让人家送过来，有的是我们派人去取。”时任清河训练大队某中队伙食管理员的王根富回忆，军统北平特务组长曲福乐交了几支曲尺手枪。

扶犁耕地的不会吆喝牲口，手里摇着鞭子，嘴里却对着耕牛喊着“兄弟向南，哥们向北”

根据“受训人员”交待的材料，清河训练大队编写出《军统概况》、《中统概况》等特务组织资料，它们至今仍保存在清河农场的档案室里，书本已然卷曲泛黄，翻开来，里面密密麻麻全是当年特务们的姓名及其组织结构关系。

到1949年底，狭小的炮局胡同监狱有些不堪使用。“最多时，炮局胡同集中训练了2000多人，已经放不下了。”卢凤来说。1949年底，中共北京市委做出“不能使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坐吃闲饭，要通过劳动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新人”的指示。

劳改农场的成立呼之欲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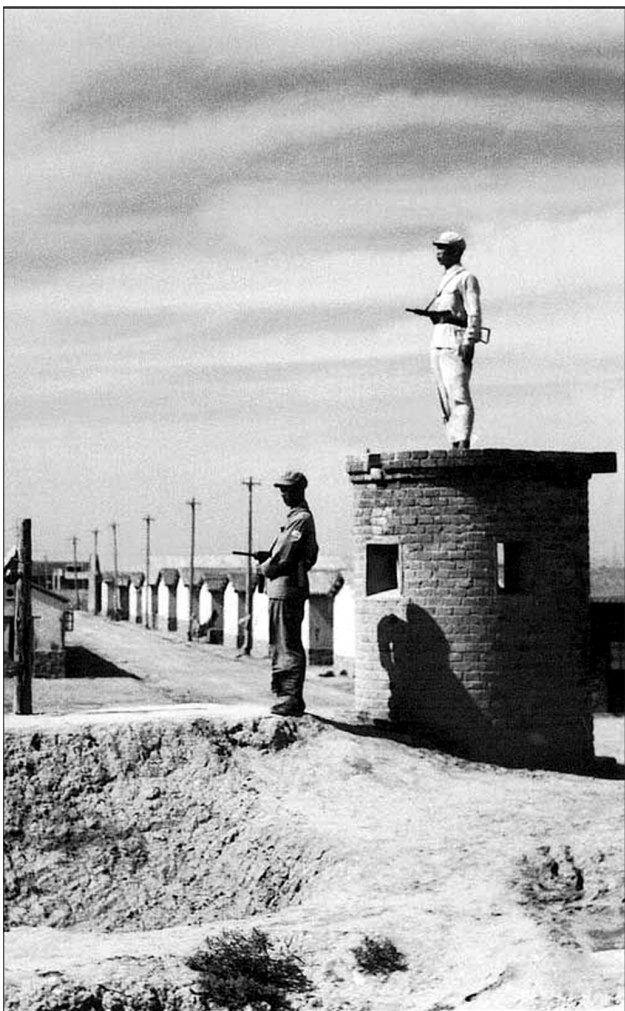
1949年11月，受当时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的委托，安林来到了天津以东一片30多万亩、从未有人开垦过的荒滩上。这里被称为茶淀地区，属于河北省宁河县，处于三条大河围成的三角地带。这块盐碱荒地就像一座孤岛，远远漂浮在与首都有相当距离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座劳改农场——清河农场，就在这里诞生。

1949年11月16日，北京市公安局派出几名先遣队员深入渤海滩涂的茶淀地区，为“清河训练大队”考察选址。12月27日，46名干部、警卫战士、技术人员解除25名敌特分子，第一批开赴这里，拉开了清河农场的建设序幕。

1950年2月24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以2400万斤小米作为启动经费，“北京市地方国营清河农场”正式成立。安林任场长。2月24日至3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将清河训教大队管训的敌特分子，分三批计1950名押解到这里，实行劳动改造。

“坐火车去的，列车上挂五六节车厢，从北京永定门开到茶淀车站。”卢凤来说。北京市公安总队调来了500多人的一个营兵负责武装看押。

当时，清河农场的武装看押



显得十分重要，一个中队收押100多人，干部有二三十人，其中有五六名小队队长，每人配备一支长枪，他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面对看押改造的敌特人员，时刻得握紧枪杆子，不是闹着玩的。”王根富说。

对于过惯城市生活的特务们来说，劳动改造简直是一场磨难。他们中能人很多，有人十多岁就开始玩枪，有的是京城纨绔，有的是高级知识分子。但对于干农活，他们简直是“五谷不分”。扶犁耕地的不会吆喝牲口，手里摇着鞭子，嘴里却对着耕牛喊着“兄弟向南，哥们向北”。几个人抓着骡子的笼头，急得脸红脖子粗却套不上车。“出尽洋相。”卢凤来说。

出工不到两天，大部分特务手上即磨出了血泡，为了逃避这种超负荷的劳动，有人甚至跳在别人解的大便上假装方便耗时，也有人假病装傻、吞食异物。

签约的时候，郭俊强的腿有些发软，“这单位招聘怎么这么简单？”那是1996年，郭俊强刚刚从中南政法学院毕业。“想来吗？”招聘人员说，“想来就没问题。”

郭俊强十分诧异，应聘一名警察可以这么宽松？他再一次仔细看了看单位介绍——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确实是北京的国家机关。家境贫寒的郭俊强没有办法放弃这个机会。

郭俊强没有想到，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并不在北京市内，而是在离北京100多公里外的天津东郊郊区，那里根本不是什么繁华大都市，而是一片比农村还要荒凉的盐碱地。

1996年7月10日，郭俊强到清河农场报到，看着一眼望不到边的农田，就来自河南农村的他也无法想象居然还会有这么艰苦的地方。眼前是一排排上世纪70年代建设的低矮红砖平房，屋内地面返潮厉害，蚊子横飞，再加上年久失修，许多红砖房屋顶漏雨。

而那个时期的清河农场，一直以农业经济为主体。“每天你看到的就是戴着草帽的

犯人争先恐后“露鼻子”

现在的人也许很难想象那时的干部觉悟。当时的劳改干部与这些历史反革命们几乎同吃同住。干部还要带头。挖水渠时，许多干部把裤脚一挽，赤脚下到冰冷的烂泥里带头排水挖泥。

劳改干部大都出身贫寒，一个个身经百战，但却没有文化。“当时我们属于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因为没文化，被人称为‘傻老五’。”卢凤来说。

国民党特务们却正好相反，他们当中不少都是富家子弟、大学生。“说实在的，要是论文化，咱比不上人家。”后来当了清河农场副场长的王根福说。

对于这些有文化的历史反革命，当时执政的需要，也是革命形势和国际形势及国家安全的需要。“现任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政委王金亮，提起这段历史时说。

农场机关曾连续五月没发工资

郭俊强签约以来积聚的忐忑不安一下子全部迸发出来。到达清河农场的第一夜，他喝醉了。其实，郭俊强的经历并不算清河农场招聘史上最离奇的。1995年，清河农场在内蒙古招聘大学生时，招聘人员甚至问出了“假如三个月不给你工资，你还会不会来”的问题——这并不是故意考验应聘者，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清河农场干警的工资真的要迟发一个季度，1月份的工资可能在4月份才能下发。清河农场机关甚至曾经连续五个月发不下来工资。

“有时候我们发工资要到宁河县去借。”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政委王金亮回忆说，当时，国家只负责劳改机关经费开支的一半，另一半要靠自己创业，自己挣钱。那年月，在清河农场的所有领导中，谁管财务，谁能搞到钱，谁就最有权威。

而那个时期的清河农场，一直以农业经济为主体。“每天你看到的就是戴着草帽的

一年的“犯人”来说，震动可想而知。他们的干劲很快上来了，“都争先恐后‘露鼻子’。”

在一份“关于茶淀农场筹备工作汇报”中，对他们的表现这样描述，“孙继英认为在设计方面比别人都强，但郑君成和陈子厚就不服，纪鸣远在农田水利上有经验，但为了表现自己，就不愿意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告诉别人，苏金城为了表现自己，直接给干警写建议书……”

当时清河农场的基建处，可以说掌握了旧中国最高的技术水平。整个50年代，清河农场在北京乃至全国都广为人知。

到1951年6月，清河农场已收押了5000多名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劳动改造换来了一条中心干渠，两座大型扬水站，还有纵横农场的大小渠道。“渠道设计得相当科学，有的是自己设计的，有的是请苏联专家设计的，也有的是被改造的反革命分子设计实施的。”卢凤来说。

反革命分子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生产劳动，这在清河农场的领导层中曾经发生过许多争论，包括是否要使用有文化的反革命分子，都成为争论焦点。在当时清河农场分管管教工作的副场长李一平看来，管教永远是第一位的，干部与反革命分子之间毕竟是“敌我矛盾”。这个矛盾经常表现得非常极端。

1950年3月，军统特务兴安站少将站长冯兰亭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认为时机已到，纠集6名同犯建立“蒙难同志会”，密谋潜逃后拉几百人到太行山打游击，被其他特务告发。同年，军统塘大分局局长杜锡进密谋集体越狱，亦被告发。但杜锡进再次潜逃，被抓后执行法办。

不过，大部分特务已经接受了“改造是唯一出路”的观念，在劳动中等待着新政权给予宣判。1950年7月12日，清河农场举行第一次全场宣判大会，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440名国民党特务宣判了劳动年限，刑期最长的五年，最短的半年。

在《清河农场五十周年大事记》一书中，第一次提到“镇反”是在1951年4月25日：清河农场根据市局指示将镇反运动中应镇压的399名罪犯押解进京。于当晚7：00时安全抵京。“卢凤来和王根福都亲自押解过要被‘镇反’的罪犯，‘用的是火车’。”这是当时执政的需要，也是革命形势和国际形势及国家安全的需要。“现任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政委王金亮，提起这段历史时说。

警察与带着镰刀的犯人下地劳作，那场景十分怪异。”王金亮说，清河农场的干警们都被称为“农民警察”。农场生产的粮食先是交公粮，毛粮交给国家，然后监狱再去买成品粮。

除此之外，清河农场还有造纸厂、机械厂、粮食加工厂等几家工业企业。但改革开放之后，监狱经济的政治优势逐渐丧失，政策保护、减免税收……一把把“保护伞”被收了回去，只剩下了廉价劳动力（犯人）。清河农场几家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全都濒于破产。与绝大多数监狱一样，清河农场也走向了来料加工的道路。

监狱大都远离城市，尤其是清河农场。这种布局从清河农场的第一代起，就在农场职工干警身上烙下了深深的痕迹。“虽然到北京人，但许多人一辈子都没到过北京。”原清河农场教育改造处处长、73岁的崔乃贵说。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有一些清河农场干警第一次到北京城，都会专门找一家西餐厅吃一顿传说中的西餐。

1969年，清河农场实有犯人仅2人，无劳动教养人员。1970年，清河农场实有犯人为“零”

仍习惯称清河农场

实有犯人曾为“零”

“革命需要”在1957年之后愈发强烈。那一年，又一批“专政对象”被送入清河洗刷罪恶。

此刻清河农场内部早已滚动成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成分复杂。“那个时候，我们一度被戏称为‘清河国’。”原清河农场教育改造处处长、73岁的崔乃贵说。

从1959年开始，与全国其他农场一样，富足的清河农场也开始实行粮食定量。1960年前后，全国饥馑，劳改农场自然是首先削减粮食供应的地方。从1957年底开始，每个犯人的月定量由45斤降到了21斤。

随着灾荒严重，代食品也愈加多样化，豆秆、榆树皮、稻草，以及其他可以粉碎的植物根茎都变成代食品。灾荒带来了平静，“大跃进”的锣鼓平息下来，这是一段罕見的没有政治运动的日子。

1966年“文革”发动，“这一次，整个清河农场都被打散了。”王金亮回忆说。

清河农场进入了军管时期，一个分场一名军代表。1969年，军代表对当时清河农场所管人员及其家属进行战备疏散，在38天内，将13000多人疏散到了河北、山西等25个省区。1969年，清河农场实有犯人仅2人，无劳动教养人员。1970年，清河农场实有犯人为“零”。此时，绝大部分干警也被遣散到北京周边县区劳动。

刑事犯没有政治犯好管

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在新中国成立30年后终于出台，自此，“刑事犯”逐渐成为清河农场收押的主流。

“当时的老监舍围墙只有2.2米。1996年，一夜大风就吹倒了一大片围墙。条件可想而知。”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政委王金亮说，看押罪犯的任务十分艰苦、艰巨，一到下半年，玉米、高粱等高秆农作物起来，如同“青纱帐”，罪犯逃跑风险很大。

犯罪分子当时都在大田劳动改造，而那时的监狱警察连一辆像样的车都没有。更可怕的是，甚至有犯人挖洞已挖到大墙之外，暴狱的危险随时存在。

“这些罪犯恶习深、性情粗野，在监狱里的纪律意识差，管理难度也大。”王金亮说，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犯人的素质降到谷底。

老一輩清河干警比较怀念有文化的“监管对象”，“听话，懂道理，讲清楚了就会干得很好，累得直不起腰来也没有怨言。”崔乃贵说，而这些刑事犯，“没有文化，就知道闹”，有时稍有口角，拿起砖头、铁锹就打架。



新鲜的法治试验

1983年，老公安魏相如主政北京市劳改局时，“严打”正如火如荼。刚从北京市公安局独立出来的劳改局，已划归正在重建的司法系统。

魏相如担负的是监狱整顿与改革的重任，没有人告诉他到底朝哪个方向走，而他发布的第一个革新之举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不准给犯人剃光头”。

魏相如的“不准给犯人剃光头”推行了一年多。1985年，清河农场某中队跑了一个犯人，农场政委一怒之下，犯人一夜间又全被剃了光头。“我把了一年的道理，还是没能把他们的观念扭转过来。”魏相如非常恼火。

1985年初，魏相如再次提出了革新举措——给将要刑满释放且一贯改造表现好的犯人，按照一定比例放假三天，让他们直接回家过年。如今24年过去了，这个试点运行完好。

“我们不可能什么都踩着脚印走，那还怎么改革。”魏相如说。同样是在1985年，他甚至批准了两名犯人在服刑期间结婚。

从劳改农场步入“监狱”角色的清河农场，有太多的空白需要填补。整个80年代，改革气息弥漫在整个监狱系统上空。

“报告政府”到“报告警官”

如今，清河分局各监狱崭新的监舍看上去更像是一所大学。两道宽约十米的大铁门，混砖结构五六米高的围墙，上面密布电网。走进清河农场清园监狱，就会看到一个比足球场还要大的广场，两边是一色的三四层崭新楼房。每个监舍30余平米，住着8~12名犯人。监舍里有电视，有独立洗手间。

反革命的罪名早已消失，现在关押的主要是刑事犯。清河农场的正式名称已经是“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但在监狱管理局内部，它仍然是偏远的北京“飞地”，人们仍然习惯称之为清河农场。

这个偏远的“小岛”，早已告别了农业改造的时期，犯人劳动不再出监，监狱干警不再是“劳改干部”，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监狱人民警察。

1994年《监狱法》颁布实施后，国家正式取消“劳改”一词，一律以“监狱”来称呼各式各样的监狱。劳改农场成为历史，监狱的刑罚特征逐渐取代政治性特征。一个细微但却鲜明的特征是，犯人有事以前喊“报告政府”，现在是“报告警官”。

帕金森 脑萎缩

中国工程院两院士、八位教授发现脑康复奥秘——研发中药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95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益肾化浊法”课题组（项目编号969060903）研究发现：肾精亏虚，气血运行失常，脑内浊气堆积，化生浊毒，败坏脑髓，损伤络脉是导致各种脑病发生的根本原因。

2008年，项目组的中国科学院两位院士和八位教授总结出治疗脑病的“一化、二养、三健”益肾化浊疗法，研制出复方

痴呆新药 中风问世

扶蓉益智胶囊，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具备：1.技术创新性突出；2.社会效益显著；3.推动行业科技进步作用明显）这是我国目前中药治疗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中风后遗症等脑病的至高奖项，收入国家药典并获新药证书（国药准字Z20080047）。填补了我国利用中医治疗脑病的空白，打破了老年痴呆和帕

金森综合症治疗一直由进口化学药品垄断的格局，彻底改变了国内脑病治疗缺少特效药的劣势。

复方扶蓉益智胶囊中独含的“化浊因子”和“脑神经多肽”能排除脑内毒素，修复受损的脑神经细胞，重塑大脑神经网络，从而恢复大脑对人体的支配功能。经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对帕金森、脑萎缩、痴呆、中风后遗症疗效显著，安全可靠，有效率极高，一般患者1-2个周期就可改善记忆力及肢体、语言障碍等临床症状。即使10多年的重症患者，坚持用药配合功能锻炼恢复健康，过上健康生活。

由课题组专家编写的脑病康复手册现已到成都总府路3号2楼，患者致电028-86783090可免费索取，专业医师解答及功能康复按摩师制定康复方案。

中国脑部健康网: www.zgnbjk.com

眩晕真危险

眩晕症如不及时治疗可引发重大疾病危及生命，眩晕本身就是中风的先兆！

以前国内一直没有治疗眩晕的特效药。99年起，著名的昆明中药厂根据止眩安神汤的经典验方，结合中医实践利用先进的技术将鹿衔草萃取其精华与数十味名贵中药配伍研制出止眩安神颗粒，是国内专门治疗眩晕症的国药准字甲类OTC产品，特含“平衡造血因子”，营养保护大脑神经，调节前庭及平衡器官的功能，消除眩晕、耳鸣、失眠、心悸等症状。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人体气血虚损，颈椎病，美尼尔氏综合症，更年期综合症，植物神经紊乱，劳累过度等均可引起眩晕。止眩安神颗粒是真正的复方制剂，药力强，效果确切。眩晕患者若按疗程服用，症状即可缓解。再巩固治疗，就能解决。成都神草堂大药房（大慈寺路77号）有售，详情可致电：028-66686044。

美国研制打鼾专用药

美国科学研究发现，导致打呼噜的罪魁祸首是喉舌，喉舌导致鼻腔、喉咽肌肉松弛、肥大、鼻咽喉部呼吸的气流被堵塞，产生涡流并引起震动，从而出现鼾声，严重时吸气、呼气被彻底阻塞，导致呼吸停止，从而引发心肌梗死、脑梗塞和猝死。这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美国百欧迈斯实验室联合科研专家经过三年的艰苦攻关，耗巨资终于研制出治疗打鼾的专用药物——解停安，从多种纯天然植物中提取出高活性成份，特创口含片剂型，药物分子直达鼻咽部病灶，清除喉舌，有效治疗打呼噜。服用解停安：第一阶段：口干舌燥症状减轻，鼾声减轻。第二阶段：舌湿润，气流顺畅，呼吸暂停现象减少，头痛症状减轻，睡眠质量明显提高。第三阶段：轻度患者鼾声消退，睡眠香甜，大脑供氧充足，白天不再嗜睡、头痛、眩晕症状消失，严重者持续用药2-3个周期即可。

据悉：“解停安”已引进四川，资阳市神草堂大药房（大慈寺路77号）独家指定销售。详情可致电：028-86654530。